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荟萃

GONG CHAN GUO JI YU ZHONG GUO GE

MING GUAN XI SHI YAN JIU HUI CUI

28

翟作君 主编
夏旦大学出版社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 命关系史研究荟萃

主 编 翟作君
副主编 吴小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共济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荟萃

主编 郑作君 副主编 吴小松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国权路579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宜兴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300千字

1990年2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1—5,000本

ISBN7-309-00483-3/K·21 定价：4.50元

说 明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在我国开展全面的研究已经十年，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版、发表的论（译）著、论（译）文数以千计，为了集中概括地反映这些研究成果以适应广大的党史、革命史、共运史教师和研究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及广大读者了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需要，我们继1986年、1989年编写出版《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研究荟萃》之后，又组织华东师大1988级中国革命史研究生班学员、第三届中国革命史助教进修班学员和部分研究生编写了这本《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荟萃》。有几点说明于下：

一、本书内容涉及到共产国际从建立到解散这一历史阶段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以及共产国际解散后的6年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书中所汇集的研究成果包括1979至1989年出版的著作和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

二、本书反映的是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对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的观点着重进行介绍，意见一致的观点和介绍性的问题一般采用述评的方式表述。

三、书中正文引号内的话，除了出自经典著作和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文章、党的文件外，一般不注明出处。篇末均有主要参考资料索引。

四、本书编委成员有（以姓氏笔划为序）：

帅瑞芳 吴小松 吴志刚 吴 灿 杜道宏 杨贵昌 鲁辉
周玉凤 翟作君

五、参加编写的人员有(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智慧 王子云 王子韩 王尊义 方彦雄 皮正华 冯进成 申莉 帅瑞芳 任友玲 刘世平 朱秋林 吴小松 吴志刚 吴其良 吴灿 李卫群 李正昌 连志崧 汪其昌 宋进 杜道宏 何薇 罗正月 陈少晖 陈用芳 周玉凤 赵宁生 赵崇华 杨贵昌 杨鹏 柴方 徐利剑 高继民 盛一平 郭东彬 郭继堂 黄迪何 舒敏勤 翟平 蔡娟 鲁辉 魏益宝

六、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华东师大政教系党史教研室、资料室、复旦大学出版社林骧华等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特表感谢。

七、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掌握的资料不足，书中难免有疏漏或不妥之处，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者

1989年12月

目 录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十年情况综述(1979—1989)

1

总 论

共产国际的建立	11
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	15
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20
关于国际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	2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思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26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

加拉罕三次对华宣言	31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34
建党初期马林的贡献	37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41
建党时期的杨明斋	45
马林与陈独秀的一次冲突	48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51
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的政策	54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	57
共产国际“四大”《关于东方问题提纲》	60
《孙文越飞宣言》	63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指示	66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鲍罗廷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71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	74
苏联对中国大革命的军事援助	77
苏联顾问与黄埔军校的建立	82
共产国际与中共“四大”	86
苏联顾问与广东根据地的巩固	89
共产国际与冯玉祥的国民军	92
共产国际与“五卅”运动	95
莫斯科中山大学	98
布勃诺夫使团的中国之行	101
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104
共产国际与中山舰事件	108
加伦与北伐的胜利进军	110
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国问题的一场争论	114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	119
斯大林关于中国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124
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错误	128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政策的转变	132
共产国际与东征讨蒋战略	135
鲍罗廷与罗易在中共“五大”前后的争论	137
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142
共产国际《五月指示》	145
大革命失败与共产国际的历史责任	150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	155
共产国际与“八·七会议”	159
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	163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论	167
罗明纳兹与瞿秋白的“左”倾错误	171
广州苏维埃与共产国际	175
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178
共产国际的指导与中共“六大”	182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	186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89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东路问题	193
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	197
关于“绝对地无条件地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201
共产国际的反倾向斗争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204
共产国际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207
共产国际与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211
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214
王明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	217
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220
共产国际与中共对福建事变的策略	224
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227
共产国际与遵义会议	230
共产国际与察哈尔抗战	234
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与共产国际	238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与共产国际	241
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间阶级的政策	243
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时期白区工运政策问题	247
共产国际的俄国革命模式与中国国情的矛盾	250
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253
共产国际与《八一宣言》的制定	257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的情况	259
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形成问题	261
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的演变	264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268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	273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的援助	276
共产国际与王明右倾错误的关系	279
季米特洛夫与中国共产党	284
苏联、共产国际与“皖南事变”	288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	292
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战争	296
共产国际、苏联与盛世才的关系	300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	304
共产国际高度评价毛泽东	308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围绕“保卫苏联”问题的争论	311
延安整风与共产国际	314
弗拉基米诺夫与《延安日记》	317
共产国际的解散	321
关于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	324

共产国际解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

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两党在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场论战	329
关于《雅尔塔协定》	333
关于1945年的中苏条约	337
苏联出兵东北问题	340
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过我军过长江的问题	344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十年情况综述(1979—1989)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之间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客观地存在了二十多年，现在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由于种种原因，过去，这一问题只能在我们党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内部进行讨论，在公开场合总是加以回避，学术界则更是讳莫如深，不敢问津。

我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开始全面的研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我党重新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学风，学术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广大史学工作者在重新反思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也触及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发现，如果回避，甚至无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曾产生过深刻影响这一事实的话，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就无法弄清楚，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也就必然影响到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作出科学的总结。因此，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这一任务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以1979年向青同志发表《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一文为先导，学术界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到1989年正好十年时间。现将十年的研究情况综述于下：

一、概况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

就呈现出十分可喜的局面，十年间，史学界形成一个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热潮。其显著特点：

1. 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翻译工作成绩显著。

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过去在我国完全是个空白。十年来研究者整理翻译出版了一批文献资料，为研究工作的起步和前进奠定了必要的资料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1919—1928），第二辑（1929—1936）；孙武霞、许俊基等选编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第一辑（1919—1924）、第二辑（1925—1927）是目前已出版的两套最集中的文献资料集。前者从卷帙浩繁的共产国际历史文献中，选译了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决议、报告和函电等；后者内容包括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指示、函电；共产国际代表的文章、讲话；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有关决定所作的相应决议，中国共产党人的有关文章等；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和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合作编译的《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一辑（1919—1927）、第二辑（1927—1937）包括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有关中国革命的讲话和文章，《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社论、评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撰写的政论文章和通讯报道等，这三套资料为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依据。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曾派遣大批的代表、顾问到中国，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很大程度是通过他们在华活动产生的。他们在中国的有关文献资料的整理翻译工作也十分引人注目，《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等，汇集了这些与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人物当时的讲

话、报告和发表的文章以及当事人对他们的回忆材料，这些都是研究了解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十分有价值的材料。

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撰写的回忆录记录了他们作为当事人参与历史活动的具体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者从《罗易回忆录》（上、下册）中，既可以了解到罗易的思想和生平实践，又可以透过罗易在华活动情况加深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理解。达尔的《中国回忆录》（1925—1927），康奇茨的《苏联顾问在中国》，切列潘诺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勃拉戈达托夫的《中国革命纪事》，阿基诺莫娃的《中国大革命见闻——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大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情况和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反映了当时历史的概貌。由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出版的李德的《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虽然在许多方面歪曲了事实的真相，但它为研究红军长征前后的历史及与共产国际关系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佐证材料。

国外不少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由于在资料等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研究工作起步较早，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国内研究者在引进这些成果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美国学者罗伯特·诺贝等编写的《罗易赴华使命——1927年的国共分裂》一书提供的材料和见解，有助于我们对大革命的失败原因和历史责任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思考。联邦德国学者郭恒钰编著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4—1927年共产党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系统地考察了国共合作的由来和走向以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读后颇耐人寻味。此外翻译出版的还有原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克劳丁撰写的《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等，这些国外学者的著作被引进，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

资料的整理、翻译，为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积累了必要的资料，为研究者撰写“信史”打下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同

时也填补了一些资料的空白。如《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丰富了共运史、现代史的内容；巴库林的《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书中收集的一些资料经常被苏联和欧美国家史学著作引用，而在我国已难以找到。这些材料与国内研究者见面对搞清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2.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逐渐向纵深处发展，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体系初步形成。

据不完全统计，这方面已发表的论文（含译文）近千篇，出版的学术著作10余种。这些研究成果呈现出一个以历史时间顺序逐步推进，由粗线条研究向纵深处深入的特点。在研究的起步阶段，研究者多是从总体上勾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轮廓，如“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大革命”等，或是对某次会议、某一人物进行介绍，这对从未接触过这一专题的研究者起到引导入门的向导作用。在此基础上，研究全方位、多层次地展开，既对中国革命史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如关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与共产国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与共产国际等问题发表的论文都在30篇以上，并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而不同意见的争鸣反过来又促进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同时又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研讨，如布勃诺夫使团的中国之行，共产国际与察哈尔抗战、共产国际与查田运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恢复等等，真可以说是事无巨细、无事不论，中国革命史中几乎所有问题都被放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进行一番新的审视。最近两年，各省学者还开始结合本省的历史情况进行研究，如东北学者正在研究共产国际和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有关问题，新疆学者正在研究共产国际、苏联与盛世才的关系，均已做出一定成绩，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丰富了这一课题的研究。

国内学者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还不多见，但已开始了零的

突破。纪事和大事本纪往往是专题研究的基础，并为专题研究提供了线索，杨云若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 纪事（1919—1943）》填补了这一空白；黄修荣的《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一书脱颖而出，是我国第一本，也是十年唯一的一本阐述某一历史事件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专著。在研究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在中国活动方面成绩突出，已出版了于俊道的《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和翟作君《共产国际顾问在中国》两部专著。

最使人感到欣慰的是短短十年时间，已经出版了一批系统阐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系统地研究。向青编著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是国内的第一本。1985年作者又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叙述了从共产国际的创立到解散以及作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延续的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凝结作者十年心血的力作。许俊基撰写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简史》是一本按专题探讨这一问题的专著；陈再凡所著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则按共产国际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来阐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孙武康《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吸取了国内研究的新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知识性；杨云若、杨奎松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占有了大量的史料，史论结合、分析较透彻；国内目前最详细的一本专著要数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洋洋60万言。几年之间，有这么多专著问世，真可谓是极一时之盛，而且这些著作各具特色，将他们结合起来，互相补充，便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全貌。经过十年的努力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体系已初步形成。

3. 这一课题的教学活动十分活跃，研究队伍逐步形成。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开始研究不久，一些高校，如北大国际政治系，人大党史系，四川大学历史系、华东师大和上海师院政教系等分别给本科生或进修生开设专题课，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讲授，有的还编写了教材。不少党史教师还举办了这一问题的专题讲座。随后，各高校普遍开设这一专题课程。这一课程的开设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增强了他们对历史了解的整体感和多层次感，因而引起学生的广泛兴趣，受到普遍欢迎，也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投身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这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人大党史系，北大国际政治系等不少单位还招收了一批批专攻这一方向的研究生，并已经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这批中青年学者具有思维敏锐，知识面广，外语基础扎实的特点，很适应这一课题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新生力量的成长，为这一问题研究阶梯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逐步形成。

4. 学术交流空前活跃，研究由自发转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活动最初是由各地学者自发进行的，因而受到资料缺乏，信息不通的限制。随着科研与教学活动的进行，学术交流也逐步开展起来。1980年由北大国际政治系和北京师院政教系出面，在北京地区召开了两次小型座谈会，交流了情况和资料，互通了信息，研究者之间建立了初步的联系。在此基础上，198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在四川温江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座谈会，并适时地成立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研究领导小组。一些省、市，如上海，四川也相应在省、市党史学会下设立了这一机构。这一专题的研究也开始由自发转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

学术交流的开展，使研究工作由北京等少数地区走向了全国，一时形成了一个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热潮。1983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此后，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中共党史学会于1984年在上海、合肥、长春举行了第三、四、五次学术讨论会，分别对党的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并出版了论文集，还计划于1990年举行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加强了全国学者间的联系，促进了研究深入进行，会议出版的论文集是国内该阶段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的反映。

综上所述，可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这块处女地，在沉默了几十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开垦和耕耘。尽管研究工作开展时间不长，但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却十分喜人，开拓者筚路蓝缕，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预示着一个美好的前景。

二、深远意义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在我国全面展开，产生了以下影响：

1. 填补了空白、丰富了中国革命史的内容。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过去一直只有国外学者在研究，国外学者在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时，西方学者较多是否定的，苏联学者全盘肯定，而我国学者则长期沉默。经过十年来的努力，我国学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终于填补了这一空白。

中国革命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发生、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应是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

不可缺少的内容。十年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使中国革命史的内容得到充实，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完善。

2. 开阔了研究者的眼界、弄清了许多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澄清了不少是非。

十年研究，学术界几乎对中国革命史所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一番穷源溯流的反思，使许多问题得以正本清源。

如，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问题。过去我们只知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说，只知道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建党中的贡献，学术界过去对国内外敌人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强行移植”的谬论多加以回避，没有给予正面回击。现在，大家了解到，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中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在中国才开始有建党的实践，共产国际的帮助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保证了它一开始就能沿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方向前进，共产国际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这种作用并不是什么“强行移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也必将应运而生。不顾事实把共产国际作用夸大为决定性的、是错误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

又如，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的形成，“党内合作”方式的提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都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有直接关系。过去的史书对此都未置一词。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是马林通过考察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后首先提出国共合作的建议的；为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国际曾多次发来指示；鲍罗廷在帮助国民党改组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形成的，而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中犯了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错误，对资产阶级右翼争夺领导权采取退让与妥协的政策，致使统一战线最后破裂。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不了解这些事